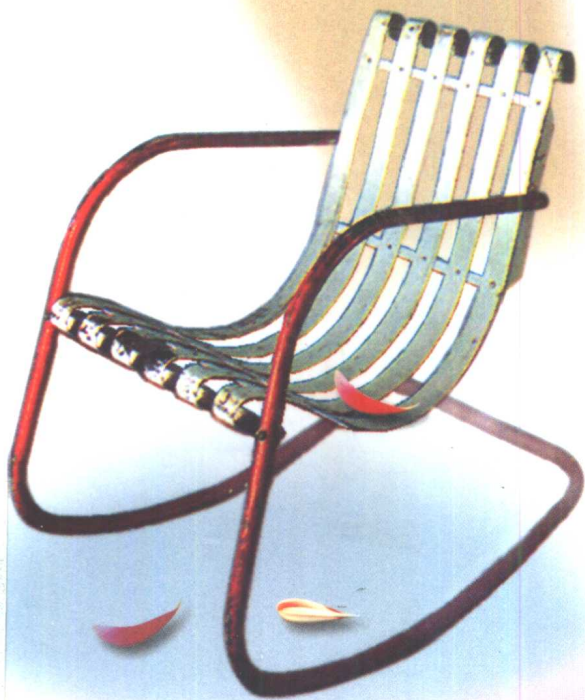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之三

两代 腐败者的 比较



長
去

书
馆

長
去

两代腐败者的比较

刘成信 杨
翰·李·君 编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
(之三)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

两代腐败者的比较

刘成信 杨怡 李君 编

责任编辑：杜菲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7年1月第1版

印张：10.5 插页：4

1997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235 000

印数：8001-23000册

ISBN 7-80604-525-2 / I·98

定价：13.50元

总 序

○刘成信

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迄今，已近半个世纪，杂文创作几度挣扎，几度起伏，曾呈蓬勃之态，亦曾濒临绝境。在整个文学领域，杂文这个中国独有的特产可谓命运多舛。这套《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便是在那社会几度宽容中出现的大量杂文和风雨如磐、万马齐喑的岁月夹缝中成活的极少杂文中遴选出来的。选编者从1988年8月至1996年8月，历时8载，查阅海内外报刊逾千种，几经筛选，反复比较，共收300多位杂文作家、作者的作品500余篇。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力争兼顾：思想内容客观、公正，题材广泛，艺术技巧高超，风格流派多样。换言之，题旨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选；内容陈旧、缺乏新鲜感的不选；人云亦云、喋喋不休拾人牙慧的不选；板着面孔训人、尽讲大道理的不选；思想肤浅，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不选；隔靴搔痒，爱也不深、恨也不烈的不选；平铺直叙、枯燥无味、毫无可读性的不选；哗众取宠、故作惊人、经不起岁月考验的不选；仅作家本人有名气而作品却无艺术生命力的不

选。以文取文，不搞平衡分配；一视同仁，不论资排辈。

这样的遴选原则与标准，也便注定了本《文库》作品年度分配比例与其它杂文集有所不同。所选近50年间的500余篇杂文中，50~70年代的仅有35篇，80年代选69篇，其余410篇均系90年代前期杂文。从篇数看似有不平衡之感，之所以如此，有着特殊的缘故——

(一) 杂文与政治气候宽松与否有极密切的关联。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舆论监督手段中最有效者之一，因此，杂文需要广开言路的社会环境，需要官员们具有纳谏的襟怀，需要从善如流的闻过则喜精神，需要时代的正义压住邪恶与暴戾。50~70年代期间，仅有两度暂短时间给杂文以生存的权利，大家取得共识的是1956~1957年上半年及1961~1962年约一年多，总共不过3年左右。1979年之后，除了1989年下半年~1991年又经历一段短暂的消沉，杂文基本上是沿着其应有的规律、势不可挡的态势发展着、壮大着。尤其是从1992年“主要是防左”的告诫传达后，90年代前期杂文呈多格局发展，其数量之巨、内容之广、艺术表现手法之娴熟，风格流派之多样，都是近50年来空前的，堪称精品者也最多。

(二) 50~70年代即便有两度极短暂的杂文相对繁荣时期，但当时的杂文作家、作者很少，发表杂文的报刊相对来说也很有限；更由于这两个极短时期原本就是在整个思想禁锢的社会大背景中的相对宽容，小心翼翼的批评尚且要看事由、对象，遑论大刀阔斧地针砭时弊、抨击腐败！提名道姓不可，泛指概谈也不许；题材狭窄、禁区颇多，只能温和隐晦、轻描淡写、点到为止，真正体现杂文特有功能、特有个性者十分匮乏，其中“文革”10年几乎无一篇优秀杂文可选。

(三) 50~70年代,大多数杂文与杂感、杂谈相近,或讲道理,或谈感受,或图解政策,或标语口号,逻辑推理,等同政论,忽视杂文的形象性、艺术性,以当今的标准和读者口味衡量,能收入精品文库的便不多了。

(四) 50~80年代的优秀杂文,基本上已收入各种版本的杂文集,为避免重复出版,我们相对地减少这个时期的杂文。而90年代前期发表的杂文成集者较少,且多为一个或几个作家结集。因此,我们把遴选精品的重点放到90年代前期,以期填补目前90年代杂文精品集之不足。

“选学”,是一专门学科;“选家”,亦需有胆有识,我们不是选家,更无多少遴选经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努力去摒弃我们意识到的已出版的各种选集中的某些弊端,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共和国成立近50年来优秀杂文之风貌。

二

为方便研究、评介近半个世纪的杂文创作,我们试图把50年来杂文创作个性突出、成就显著的杂文作家分作三代。即50年代到文革前的杂文作家为第一代;文革前即开始杂文创作但直到80年代才蜚声“杂坛”者为第二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杂文作家为第三代。

第一代杂文作家大体由文化宣传战线上的领导、专业作家、编辑家组成。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邓拓、吴晗、廖沫沙、曾彦修;胡风、艾青、巴人、唐弢、聂绀弩、柯灵、徐懋庸、吴祖光;冯雪峰、袁水拍、萧乾、孔罗荪、林放、黄秋耘等。这些人组成的创作队伍当然是精悍的、高水准的,但其中只有很少几位专事杂文创作,实在谈不上是一支杂文作家队伍。

只是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禁锢解除，中国才真正形成一支可观但仍不十分宏大的杂文作家队伍，这即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代。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专事杂文创作，著作颇丰、影响较大的有舒展、蓝翎、牧惠、谢云、章明、老烈、何满子、陈泽群、虞丹、王大海等。第二代杂文作家承上启下，不仅继承了鲁迅先生和第一代杂文家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斗争精神，而且强烈的忧患意识、超前意识、批判意识、独立思考意识，使他们的杂文振聋发聩，也为第三代杂文作家树立了榜样，从而成为中国杂文继往开来的中坚。

除上述已步入或正在步入老年的第二代，8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杂文作家可称之为第三代。陈四益、吴非、章采、冯日乾、丹赤等中年杂文作家及鄢烈山、朱铁志、张聿温、朱健国、安立志、何龙、曹亚瑟、杨庆春、刘洪波等青年杂文作家，都在90年代杂文创作中显示出潜力和才能，他们有可能成为跨世纪的中国杂文界脊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一批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加盟杂文作家队伍，成为80~90年代杂文创作景观之一。如王蒙、李国文、蒋子龙、谌容、戴厚英、马识途；吴祖光、魏明伦；邵燕祥、刘征、公刘、叶延滨等。他们的杂文创作因融入其它文体的养料，嫁接出了具有特殊杂文味的佳作，使当代杂文呈更加色彩斑斓。

50年代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萧乾的《“上人”回家》、夏衍的《“废名论”存疑》、曾彦修的《论“数蚊子”》、巴人的《况钟的笔》等篇什或单刀直入、或借题发挥，讽刺、批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

60年代初，杂文稍呈复苏，便有马南邨（邓拓）的《燕

山夜话》、吴（晗）南（邓拓）星（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及《人民日报》的《长短录》问世。他们以批判的眼光和思想家的胆识提出一些沉重的社会积弊和社会现实中关系国家、人民利益的迫切问题。融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亲切明快，精练清畅。虽然受时代及当时观念、政策的局限，“对时弊的针砭只能藏起一些锋芒”，但这些杂文确实为当时的社会吹进了一缕智慧和真理的新鲜空气。此间以邓拓的《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等，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郑板桥的两封家书》等反响较大。

70年代中期“文革”寿终正寝，文化专制主义结束，经历了一场历时10年的民族大浩劫，杂文与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嬗变和飞跃，题材更广阔，战斗力更强，并跻身于文学殿堂，一发而不可收。南方的秦牧率先推出《鬣狗的风格》，直刺“四人帮”及其一切鬣狗式人物，它辛辣深刻、强劲刚烈，击中要害、入木三分。接着，北方的宋振庭遥相呼应，发表了《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连类设譬，旁征博引，严厉声讨“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残酷罪行；上海的虞丹激愤于年轻的女共产赏员张志新由于说真话而被割喉，创作了《缚舌、断舌和断喉》，具有强烈的抨击力。1979年，北京的刘征借用说唱手法，以精巧的构思创作出杂文《“帮”式上纲法》，开创了当代杂文的新风格、新流派，成为怪体杂文之典范。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急如一夜春风来，当代杂文史的新篇章从这里写起……第二代杂文作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熟了，以他们为核心，杂文作家迅速聚拢，组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真正的杂文作家队伍。

第二代杂文作家邵燕祥原系诗人，80年代以后他把主要

精力投入杂文创作，迄今已出版杂文集十几部，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他的杂文多属“重大题材”，关于民主，关于法制，关于廉政，关于决策，关于教育，关于监督机制等等。思想深沉，文风朴实，刚柔相济，从容不迫，不仅充满辩证思想，而且蕴涵深邃哲理。请读读他的《大题小做》吧：“我们要政治家而不要政客；要能‘管理众人之事’的现代管理人才而不要官僚。清官总比贪官好，‘好人政府总比坏人政府’强。关于人和制度的关系，请问政治学家，而关于官之怎么叫好，怎么叫坏，请问选民。”这是看似极普通极浅显的道理，但很少有人去集纳和琢磨，经作家提炼和升华，您不觉得恍然大悟，像是在夜里走路看见灯光了吗？请读一读他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一文吧：“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作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之间作选择。”这是关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政治生活渴盼的总结，也是前人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理念，更是今人清醒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他的杂文虽无惊人之奇事，却有引人入胜之魅力；无尖酸刻薄之语，却有一针见血之功，愈是咀嚼愈是有味道；愈是联想，愈有醍醐灌顶之感。

邵燕祥的杂文灵魂是批判精神，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我想，这也许是作家善于在司空见惯的纷纭社会现象中“发现”生活之真谛，善于洞察人世间的的是是非非，善于从历史的演变与更迭中寻觅其轨迹，善于高屋建瓴地提炼出符合我们国情、民情的真知灼见，从而使他的杂文受到当代杂文作家们的推崇和赞许，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与邵燕祥年纪相近，有着相同遭遇的第二代杂文作家舒展，是50年代中期创办《中国青年报》“辣椒”起家的。当年

他风华正茂，激扬文字，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辣椒”专栏开了共和国成立以来讽刺文学之先河，遂于1957年被打入另册。沉寂22年复出文坛后，当年的“小兵”已生华发，血气方刚岁月培育的“辣椒”已做成川菜。他自己写杂文，又在主持《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期间，让数百篇杂文佳作面世，尤以其1988年倡导的风华杯征文中刊发百余篇优秀篇章而为当代杂文繁荣立下赫赫功劳。他的杂文内容充实，情文并茂，老辣尖刻，底蕴厚重。抨击腐败痛快淋漓、大义凛然；针砭时弊冷嘲热讽，正气磅礴，篇篇渗透着炽烈分明的爱憎感情。如《对监督者的监督》、《论无耻》、《粮票——股票世态——心态》、《极左与中国的未来》、《论扯皮》等篇什都能言人所未言，屡见正义之闪光。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三代中年杂文作家魏明伦。这位“巴山鬼才”于80年代连续推出令人拍案称奇的川剧，震撼当代中国剧坛。后客串杂文家，成为当代杂文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杂文与其戏剧一脉相承，行文如戏文，讲究对偶，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且选题新颖，出奇制胜，指名道姓，决不含糊，情节跌宕，幽默风趣。其作品虽产量不大，但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如《雌雄论》、《文学与自我》、《半遮的魅力》、《对联与谏语》、《牛棚读板桥》、《巴山鬼话》、《盖世金牛赋》等篇什，均角度独特，别出心裁，如泣如诉，有板有眼。读魏氏之杂文既感到其旗帜鲜明，又可见其文学修养之深、洞察力强。他曾概括作杂文需“三独精神”，即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做杂文家应如科学家，头脑里乃是“三无世界”：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此可谓其为文为“家”的真切写照，我以为，值得杂文界同仁学习、借鉴。

第三代杂文家的代表，应该讲到鄢烈山。其人年轻，其文也年轻，写杂文不过10年左右，但鄢烈山的杂文创作起点高，其文风追随鲁迅、借鉴舒展，有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之气势，无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温良恭俭让；有引经据典毋庸置疑的雄辩威慑力，无捉襟见肘浅尝辄止之平庸陋习。他的《孩子，你怎么能这样想》、《哪个魔王更可爱》、《神不灭论》、《人妖》、《冒血腥气的佳话》、《痴人说梦》等，跟踪奇闻，扫描现实，枕戈达旦，恰如快速反应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腐败和丑恶现象迎头痛击，颇具暴发力。鄢烈山的杂文创作也有不足之处，即刚烈有余而文采不足，我在4年前的一篇评论中已指出，不再赘述。

中国的杂文，寄希望于青年作家、作者。我们欣喜地看到，鄢烈山、朱铁志、刘洪波、杨庆春、曹亚瑟等一批青年作家已脱颖而出。他们的杂文创作有新思路、新视角，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创造杂文生存环境，他们抵制杂文的“软”化和“淡”化，抵制涂鸦似的随笔代替直面人生、审视现实的杂文。有了这些勇气与才气兼备的青年作家，我们有信心期待杂文成为90年代后期乃至21世纪的文学界支柱，成为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三

如果我们对整个文学创作进行一点回顾和研究，就不难发现80年代末以来有一种近半个世纪不曾有过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曾风靡一时的朦胧诗很少有人问津了，能够不胫而走的优秀小说寥若晨星，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几乎消声匿迹，脍炙人口的散文呢，也只能到10年前的杂志中去寻觅了。然而，昔日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杂文，却异军

突起，蔚为壮观。这表现在——

众多的报刊纷纷开辟杂文专栏，从副刊版到周末版，从每周一篇到每日数篇，从零散刊发到杂文专版，杂文几乎遍地开花，颇有蔓延之趋势。许多优秀杂文并非都出自大报和有影响的杂志，如本《文库》中的《说帮闲》即选自《深圳特区报》；《木桶效应与人才观》则发在《沿海时报》（广西北海市）；《阳关三叠》首发于残疾人刊物《三月风》；《“禁白酒研讨会”纪要》是纯粹的专业报纸《中国技术市场报》刊发的。

杂文书刊的出版状况也明显改善。近10年来，每年出版的杂文集均呈递增趋势，由于工作关系，仅我本人每年就有数十种杂文集见赠；专门遴选杂文佳作的杂志《杂文选刊》每年增长一倍左右的发行量，且99%以上读者系自费订购，其年度合订本每每供不应求，这也是其它文学刊物难以望其项背的。

杂文专栏的遽增，杂文书刊的畅销，表明杂文读者群的空前扩大。这种势头的确弥足珍贵，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杂文较之任何文体都更需要一个民主、宽容的社会氛围。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再也不是封闭的世界了。一言不能兴邦，一言亦不能丧邦，已成为上下共识。尽管动辄问姓“资”姓“社”者妄图禁锢人们的思想，然而也只能是逆潮流而动，终究阻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主要是防左”的警示，公仆需要舆论监督的提醒，都为杂文的活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极左与中国的未来》、《龙种与跳蚤》、《姓“资”的有多少》、《哭先师计公》、《还有敌人么》等都可视为杂文为营造生存环境而做的不懈努力。

其次，是经济体制的大变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替，

使历史的积淀成为一面多棱镜，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这使得人们不得不用全新的思维去审视、去抉择；快节奏、多层面的社会生活使读者的兴趣和审美取向发生变化，即从虚幻、苍白的象牙塔向现实、理性转移。这种社会定势，无疑给杂文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它善于剖析社会，批评世俗；它更多理性的思考，更适宜解读人生，反思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因而能够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并成为他们的知音。

再次，杂文作家、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杂文理论的探索与活跃以及杂文可读性的明显增强，也是杂文繁荣、提高、发展的重要因素。迄今，仅《杂文选刊》即团结、联系全国杂文作家、作者300余位，他们中既有名家巨擘，亦有无名小卒；杂文作家、作者队伍的壮大，保证了杂文创作质量和数量，报刊决无缺米下锅之虞。尽管当今的杂文理论仍未达到系统化、规范化，许多基础理论尚在争鸣中，但80年代以来，杂文理论、评论工作者对杂文概念的界定、对杂文的分类、杂文创作需要形象思维以及杂文的艺术生命力等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对“新基调”杂文创作导向的批评，澄清了杂文创作理论的混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理论、评论文章强调杂文的文学性、形象性、可读性，已引起杂文作家、作者的高度重视并付诸创作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杂文在80~90年代的嬗变、兴旺、发展和提高。如果这些势头得以延续和推进，我相信，当代杂文会出现更多令人难忘的熠熠生辉的新篇章。

四

回顾杂文近半个世纪的坎坷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左右

或曰制约杂文发展、成长的因素很多，除却外部的、客观的原因，与杂文界、杂文作家、作者相关的问题也不少。我想，如果我们的杂文作家、作者及杂文界同仁能够对此加以关注，也许会对杂文的未来走向有所裨益。

一是杂文题材的广阔与选题空白并存。我们说杂文题材空前的广阔，是80~90年代相对于50~70年代而言。50~70年代的杂文题材只能是世界观的改造、学习方法与态度、个人修养、节约与浪费，再就是阶级斗争之类，杂文选题不许超越禁区，敢越雷池者动辄得咎。80~90年代则不然。大，大到涉及国家、民族存亡、官员的腐败堕落、权钱交易，过去明文规定的公安政法不能揭露、不准抨击之类的樊笼也打破了；小，小到父子相处、邻里长短、生活琐事等等。真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事无论巨细，人不分男女老幼尊卑，皆可进入杂文的大画廊。

然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了题材撞车与众多题材无人问津的现象。一方面，有了一个新颖选题，你也写，我也写，以致大同小异，似曾相识，如公款吃喝、文山会海、权钱交易等。问题刚出现时，杂文立即予以针砭，既有先见之明，也有警示之力，令人耳目一新；可后来，便成了一窝蜂，写来写去跳不过已有的高度，味同嚼蜡。另一方面，有许多选题迄今鲜见，出现了不少题材上的“空白点”。比如有些干部刚一提拔便大肆贪污、受贿，组织人事部门是否应反思、自责？比如许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上级领导机关的责任是否比下级还大，不然为什么公款吃喝禁不住，“坐骑”超标难绝迹？领导视察前呼后拥，与历史上的王公大臣出巡有多少区别？为何孩子们成了全天候服务员，哪儿有欢迎、庆祝仪式，都少不了孩子们的捧场？教材陈旧、所学非所用，几十年一

贯制，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改革？住房、公费医疗改革吵嚷了十几年，步子仍不算大，其阻力何在？……

历史使命感强的严肃的杂文作家，决不会去抢题材，而是习惯于用其敏锐的目光去发现新题材。本《文库》中邵燕祥、鄢烈山、黄一龙、冯日乾等的杂文，就很少有此类缺憾。如何选取题材，是杂文作家一种敏感与责任感的体现，似应引起注意。

二是文采斐然与通篇说教并存。多年的创作实践证明，杂文的文学性、形象性、可读性至关重要。50~70年代，杂文扎根在新闻大家族之中，大多在报纸上落了户，或为中心工作敲边鼓，或作副刊这桌佳肴的一碟小菜，大多是逻辑推理，杂文的文学性被高度稀释和淡化。杂文给人的印象就是讲道理，就是干巴巴，就是议论、训人，一句话不忍卒读。理所当然地，这样的杂文便无法为更多读者所接受。80年代以来，一些杂文作家对杂文的文学性加以关注，他们从选题、构思、结构、角度、形象、语言等各个环节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力图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统一。本《文库》所选刘征的怪体杂文，魏明伦戏味颇浓的杂文，章明俏皮得体的杂文，以及其它一些借用小说、故事、话剧、戏曲、曲艺、应用文等形式的杂文，均生动活泼，别出心裁，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然而，到现在为止，仍有一些作者、编辑尚未把杂文还给“文学母亲”，误以为杂文、杂感、杂谈、议论文是一回事。凡“一事一议”或“几事一议”者均加花边用楷体字，冠以“杂文”之名目。为数不少的“杂文”平铺直叙、干巴枯燥，把种种说教强加于人，拒人于千里之外，看了开头便知结尾，如同白开水，索然无味。这是杂文创作延续很久的症结，它

不仅仅是某一篇文章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问题，更严重得多的是这样的“杂文”误导了读者，对杂文的发展极为不利，对读者群的扩大也只有负面效应。

三是千锤百炼、精雕细刻与一蹴而就、盲目“高产”并存。杂文篇幅短小，事件不多，情节不杂，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做杂文也不易”，不易在何处？要选题新颖、精当，要切入角度独辟蹊径，要作品结构别具一格，要语言辛辣幽默，要“生发”出子午卯酉，要“发现”得出其不易。这便需要反复构思，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我们发现，有些作家产量低，并非手慢笔钝，而是出于对读者的高度负责。有些杂文，要构思十天半月，甚至一年两年，这是许多成熟作家都有过的创作经历。我读邵燕祥的几百篇杂文中，就遇到过几次是作者写完的杂文搁置几年后重新修改才发表的情形。魏明伦的杂文不多，然篇篇耐人寻味，几近炉火纯青，这是极可贵的创作态度，也是极可贵的创作经验。

相反，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中青年杂文作家盲目“高产”。他们追求数量，想到就说，看到就写，急就篇、草拟篇比比皆是。我认识两位青年杂文作家，一年365天，他们竟发表150余篇杂文；80年代中期，他们的杂文还有些不错的，待到90年代初期，便很难从近作中找出佳构了。其实，在杂文界，盲目“高产”者绝非仅此两位，还有一些作者也是以写多少篇来衡量自己创作成就的，这应当说是一种不良倾向。厚积而薄发，这是创作常识，一些知识库存原本不甚丰厚者追求数量的结果只能是创作源泉枯竭，十八般武艺耗尽，创作也便告终结。

四是学养丰厚与一知半解并存。杂文家，有人称之为“杂家”，杂者，多学科知识也；家者，学养丰厚也。共和国

成立后的第一代杂文家郭沫若、茅盾、巴人、聂绀弩、吴祖光等见多闻广、知识丰富，因而他们写作起来文思泉涌、左右逢源，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第二代作家中的邵燕祥、舒展、刘征、牧惠等，第三代杂文作家中的魏明伦、鄢烈山、朱铁志、何龙等，功底深厚，强记博闻，他们在创作旺盛期都是越写越好。

而我们的一些中青年杂文作家、作者则不然，他们对事物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却往往贪多、贪大，其作品常是捉襟见肘、流于浅白。这样的作者数量不少，这样的杂文也时有所见。他们的一些作品选题不可谓不新，构思也不可谓不巧，亦不乏生动活泼之语言，可他们开掘作品总是缺乏深度。由此可见，渊博的知识是优秀杂文的底蕴；杂文，只青睐于学者型的杂文作家。

五是杂文编辑队伍参差不齐，“沙场老将”与“替补队员”并存。有什么样的杂文编辑，便有什么样的杂文，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人民日报》副刊由林淡秋、袁鹰及蓝翎主持杂文的50年代中期，曾在全国率先发出一些杂文力作，80年代中后期，由舒展主持的“大地”副刊更是精品荟萃、生机盎然。《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杂文专栏，《文汇报》的“笔会”版杂文专栏，《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的杂文，《新民晚报》的“世象杂谈”杂文专栏等都曾刊发许多优秀杂文。据了解，主持这些杂文专栏的编辑不仅敬业精神令人钦佩，而且他们都热爱杂文、精通杂文。要发展杂文，要提高杂文质量，一靠杂文作家，二靠杂文编辑。令人堪忧的是不少优秀的杂文编辑不能稳定，常常被拉到其它岗位顶职，成为游动哨。我曾调查过某省的报刊杂文编辑现状，其中大多数是不大熟悉杂文的“替补队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杂文的轻视，